

明清時期廣東絲織製造業的發展

——兼論以澳門為中轉港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絲綢全球貿易

黃啟臣 *

摘要 在海上絲綢之路高度發展的明至清前期（1368–1840年），由於明清政府於1522–1840年實行廣州一口貿易政策，所以中國絲綢從廣州出口、經澳門中轉往全球貿易，從而拉動廣東絲織製造業的蓬勃發展，成為全國三大著名絲織業中心之一。據史料記載，當時廣東的絲織製造作坊和工廠已達到142家，並有了陳啓沅兄弟創辦的中國近代第一間繼昌隆機器繅絲廠，製造出絲布、紗羅、色絹、色鍛、布絹、綾絹、紵絹、緞絹、錦緞，全銀緞、錦綺和牛郎綢等10多種絲織品，而且質量超過福建和三吳（江蘇的蘇州、常州和浙江吳興）兩中心，贏得“蘇杭皆不及，故廣紗甲天下”的美譽。

關鍵詞 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澳門中轉港；機器繅絲廠；桑基魚塘；五絲八絲；廣沙；廣緞；緞絹；錦絹

明清時期，廣東的經濟發展已進入繁榮階段，躋身於全國先進地區行列。無論是農業、手工製造業和商業（包括內地商業和對外貿易）都得到長足發展。本文擬就廣東絲織製造業發展個案作一闡述，以見一斑。

一、廣東絲織製造業之概觀

明清時期，廣東商品經濟活力使更多的手工製造業脫離農業成為獨立的製造業，而且步向城鎮集中，使廣東手工製造業步入興旺時期。絲綢製造業更加發展繁榮。

（一）明代廣東是中國三大絲織製造業中心之一

據史料記載，明代的福建、三吳（今江蘇的蘇州、常州，浙江的吳興）和廣東是中國著名的絲織製造業三大中心¹。明初，不少商人把積累的商業資本投資絲織業生產，如正統七年（1442年），南海縣商人聶天根，其家譜記載：

四世祖天根……流賈於厓門水濱，……
後以紡織為業，勤儉成家。²

至明中葉嘉靖年間（1522–1566年），廣東的絲織業已名列前茅，廣州絲織品的質量，已經達到或超過南京、蘇州和杭州的水平了，史稱：

粵緞之質密而勻，其色鮮華，光輝滑澤，金陵、蘇、杭皆不及，故廣紗甲天下³。

這就說明當時廣東的絲織品製造技術是首屈一

* 黃啟臣，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方向為明清經濟史、澳門歷史和中外關係史。

指的了。廣州的紡織工人還學習外國織造天鵝絨的技術，用順德的蠶絲和鵝毛絨混紡織成雨紗和雲紗兩種絲布，達到雨淋不濕的水平，甚受國內外市場的歡迎而銷路極佳。廣州的絲織製造業除了用珠江三角洲各縣如順德、南海等縣所出產的蠶絲為原料外，還到三吳地區收購當地的蠶絲作原料：

粵緞……必吳蠶之絲所織，若本土之絲則黯無光，色亦不顯。粵紗……亦用吳蠶絲，方得光華不退色、不沾塵，皺接易直。⁴

在廣州絲織製造業發展的帶動下，佛山周圍的絲織業也發展起來了。嘉靖、萬曆年間（1522–1620年），佛山絲織業已有若干行分工，生產出牛郎紗、官紗、花綾、金彩燈籠紗和扁金蟒袍等織品。順德縣的絲織更跑在全省前面，據史籍記載：

順德所屬諸鄉皆豐阜，以龍山、龍江兩村為最，屋宇翠飛，煙火千家，入其中儼若會垣。……綠岸樹桑，春二三月，家家皆提籠出採，取歸飼蠶，婦女治絲枲，歲獲厚利，所織貢繭，軟絲可愛。⁵

坡山之絲線良，龍江之線網良，然龍江蠶種皆購於九江，而為線為網特良。⁶

綿有絲經，有綿斜，有兼絲。有純絲，多出龍江。⁷

粵東的潮州地區絲織業也發展了。黃佐纂《廣東通志》記載：

水紬、出鵝繭，灰水煮，撚為絲，以布餘滓纏燭心土染紅，供彩用，出瓊、潮二州。⁸

與此同時，梅縣、陽江、新興、瓊州、雲浮等地的抽絲業也現了。阮元纂《廣東通志》對此回顧記載：

繭布以羅浮大蝴蝶繭能織者為上，餘野繭所織者不及。⁹

梅縣興寧的蠶絲質量更佳，原因是用山蠶培育而成：

其蠶形如蝴蝶而大，兩翼之彩五色絢爛，或雲即羅浮蝴蝶機網者，在洲之河田鄉，與興寧交界，故多興寧人，其繭則各鄉

村處處有之。¹⁰

明代廣東的絲織業，除了廣州、佛山有較大的作坊外，其他各縣的絲織業多是屬於家庭手工業。而且所生產的絲織品，除了上供“賦稅”外，主要是為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提供外貿出口商品。據《明會典》、《殊域周諮錄》、《瀛涯勝覽》、《星槎勝覽》、《明史》等史籍記載，當時提供出口的廣東絲織品種相當多，如：色絹、色緞、五色布絹、紵絹、綾絹、絨錦、織金、文綺、錦緞、紗羅、絲布、白絲、緞絹、緞匹、錦綺、紵緞彩帛等10多種。甚受東南亞各國人民歡迎購買，正如明末屈大均在《廣東新語》所記述：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¹¹

（二）清代廣東絲織製造業向機械化發展

至清代，廣東的絲織製造業發展鼎盛，並逐步向機械化的新階段發展。表現在其生產規模和生產技術比明代更為擴大和大為提高，整個生產已經從明代個體、家庭副業手工業向作坊和機房發展了。康熙年間（1662–1722年），順德縣商人梁俊偉到佛山創立機房，從事絲織生產：

梁俊偉，字桂軒，順德水藤鄉人。康熙間來佛山創立機房，名梁偉號，因家緣。誠實著聞，商業遂振。¹²

雍正（1723–1735年）以後，佛山的絲織業已發展到十八行，即八絲緞行、雜色緞行、元青緞行、花面緞行、紵緞行、蟒服行、牛郎紗行、綢綾行、帽綾行、花綾行、金彩行、扁金行、功邊行、檢杆行、機紗行、鬥紗行、洋綾綢行、通紗行等。¹³廣州的絲織業則有朝蟒行、十八行、十一行、金彩行、通紗行，其中以生產五、六絲、洋貨絲巾的十一行人數最多。而且集中於上下九西關一帶，分為東家行（老闆）、西家行（織工）組織。全盛時期，西家行的絲織工人有三四萬人之多。到了清後期，佛山絲織業的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史稱：

“光緒季年，佛山大機房二十餘家，小

中外史事

者六七十家，工人二千餘，多織絲織品，絲由順德各鄉購回，出品頗多，售於本地者十之二三，外埠四鄉量亦相等，運赴外洋則十之三四。¹⁴

佛山的絲織業老闆為了賺錢，普遍僱請未成年童工進行生產，據史料記載：

佛山在廣州以西，相距幾英里，這裡僱傭的工人和完成的作業數量是很可觀的，每年有一萬七千名男女童工從事於絲綢工作。他們的織機很簡單，但出品一般都很精緻。¹⁵

廣州生產的絲綢，如牛郎綢、金絲銀緞、五絲、八絲等都是質量上乘的優良產品，史稱：

牛郎綢，質重而細密，本於女紅能自織，近來漸以疏薄。女兒絹，閨中處子性慧而心靜，耑精畢巧，故極輕細而堅韌。¹⁶

鍛有金絲、銀絲，有金銀縛，皆以金銀抽絲和絲織之。有金衣鍛，有羽緞，冬服之，羽紗秋服之，備諸色田畢支，亦備諸色。¹⁷

清末，佛山、南海的絲織品質量有大大提高了。其中以莨紗綢最有名。其時，南海縣民樂諸鄉（林村、藻美、雲淡和華夏）於乾隆年間（1736–1795年）在盛行手工織造平紋織品和曬薯莨的基礎上，林村程家改進織機，首創帶通花圖案的織品香雲紗，很快成為飲譽中外的新織物。香雲紗的特點是透花小孔組成，質地精細，結構堅韌而軟滑，穿在身上有聲作響，故名響雲紗，後取其諧音定名為香雲紗。

莨紗綢是以平紋織成的白胚紗經曬薯莨而成的絲織品，故又名薯莨綢或黑膠綢。其加工程序是經過上莨、過烏、水洗三種工序。上莨，是薯莨的汁液多次塗於胚綢上，使絲織物黏附棕色的膠狀體，然後置於曬場上，反覆噴曬至赭紅色。過烏，是選用含有鐵鹽的泥土，稀釋後塗在已經黏附薯莨的絲織物表面，膠狀物變黑，最後將泥土洗淨，便成為油潤而烏亮的香雲紗。因為紗綢表面有一層植物膠膜，所以織品具有幼、輕、潔、透孔均勻，不黏身

體的優點，而且洗滌方便，著水易乾，毋用漿熨，是甚受東南亞熱帶國家居民歡迎的絲織品。

清末南海縣各鄉鎮的絲織業更各具特色。比如，民樂程家以織紗著稱；潘家則善於織羅；藻美以織綾出名；雲淡以織綢為上；華夏以織“安南綢”聞名邇遐；塋心以織綢、古贊以織孟買綢名揚海外。總之，南海縣的絲織業可謂是綾、羅、綢、緞、縐、紗，樣樣齊全。

到了同治年間（1862–1874年），廣東的絲織製造業更上一層，從作坊織造向近代機器織造發展了。這就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南海縣陳啓沅、陳啓樞兄弟創辦的廣東第一間機器繅絲廠繼昌隆為標志。

陳啓沅(1834–1903年)，原名如郎，字芷馨，號啓沅，南海縣簡村堡簡村鄉人。啓沅原有兄弟七人，但四個兄弟早夭，僅有三人長成，老二啓樞、老三啓標，最少者老七啓沅，家境貧困。約咸豐元年(1851年)，啓樞得其岳父麥憲培資助，到越南謀生，先在麥氏的安南商店做工，後旋自立商店經營，三年間略有積蓄，於咸豐四年(1854年)，回鄉帶啓沅同往越南料理生意。兩兄弟合力經營，先是開辦怡昌蔭號商店，經銷絲綢雜貨商品，後又承辦堤岸怡豐餉當(即當舖，時堤岸僅此一家，是向越南政府餉承的)，“約十餘年，兄弟倆已成為當地巨商了”。在此期間，啓沅為拓展商務，“至南洋，遍遊各埠，考求汽機之學”。他發現南洋市場的外國絲綢質量比家鄉的絲綢好的原因是用機器繅絲。於是產生了“特仿西人之法，變通製造繅絲之器”的想法，並決心回家鄉興辦機器繅絲廠，以振興家鄉的繅絲生產。他的想法得到其兄啓樞的讚賞和支持。同治十一年(1872年)，啓沅先期離開越南回到南海，在西樵簡村堡百豫坊創設機器繅絲廠，名曰繼昌隆。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繼昌隆繅絲廠籌建啓動。動用資金白銀七千多兩，全由陳啓樞由安南先後匯返，因此繼昌隆的股金，悉為他兄弟二人投資，從未有招收外股。七千多兩資金中，用於流動開支如收繭、工資、雜支等約三千兩，建廠設備等

約四千多兩。

繼昌隆繅絲廠址，就在陳啓沅祖屋旁邊的空地，面積約四十餘井(畝)。所用設備中有煮沸水的大爐鍋一座，高約一丈五尺，闊約七、八尺，另蒸汽爐一座，高約一丈二尺，闊六尺，配有煙囪，高達三丈六尺。該廠所用的繅絲機器，除了從越南買回一部分外國舊輪船的發動機改裝成繅絲蒸汽機外，其他各種機器是由陳啓沅自己設計，“在廣州十八甫陳聯泰機器店定制和購買現成的鐵具回廠裝置，為在廠內設有鐵工熔鑄及做木工場等，依照陳啓沅設計畫的圖樣，監工製造……”為了掌握機器，曾由繼昌隆出工資僱用的陳淡浦（1817-1876年）的聯泰號機器作坊派來的其子陳濂川、陳桃川等四名技工，專為繼昌隆繅絲廠負責大修小改的安裝工程，繼昌隆並派出學徒跟隨學習。經過一年工夫，使繼昌隆得以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天正式投產。

繼昌隆繅絲廠設司理一人，由陳啓沅親自擔任，司賬一人，行江（買賣手）若干人，另設焙繭、管工、紐絲（扎捆工）巡行、雜工、大偈（師傅）、助手等30多人；又設女管工2人。全廠初招職工300多人，後最多時發展至600~700人。工人實行計件工資制。

該廠的主要原料蠶繭，以南海縣西樵一帶為多，另外派人到東莞、順德、香山（今中山、珠海市）等縣收購一部分。繼昌隆生產的生絲精美，“全部都是出口的，銷於英法美等各國都有，尤以美國為多”。為了搞活生絲出口，陳啓沅“乃斥資自設一昌棧絲莊於廣州揚仁南街。由第二子蒲軒主持，專營繼昌隆的生絲外銷……獲利頗厚”。

正當繼昌隆繅絲廠生產蒸蒸日上的時候，地方封建守舊勢力“聯群挾制，鼓動風潮，謂此風一開，則工人失業，生計立窮”。於光緒七年（1881年），一些“無知之民相附和，幾欲將絲廠毀拆。經當道勸諭，其事乃寢”。

但是南海縣知事徐廣陞却頒布了《禁止絲偈曉諭機示》指出：

一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統計江浦一

帶，共有機器十一座，應用四千四百餘工，以一敵十較之，實奪四萬四千餘人之生業，夫以十一家殷商之攘利，而失數萬家貧戶之資生。我國家民為邦本，非同國外裔上下微利之邦，自應永遠勒停，以安民業。¹⁸

於是徐廣陞派兵查封了繼昌隆繅絲廠。在這種情況下，陳啓沅於當年十月與澳門豪商盧九（原名盧華紹，字焯之，1837-1906年）商定合作辦法後，即將繼昌隆繅絲廠遷至澳門，改為“和昌”繅絲廠，後又改名為“複和隆”繅絲廠，繼續生產。遷廠經費達到6000兩白銀，亦由其兄陳啓樞從越南匯回。光緒九年（1883年），風潮漸過，清政府亦放寬了政策。於是陳啓沅即派其侄錦笏先期回鄉修整原有廠房設備，復辦規模較小的利厚生繅絲廠；又與其子蒲軒研製一種腳踏車為動力的繅絲機，增辦利貞繅絲廠。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年），陳啓沅決定將遷至澳門的“複和隆”繅絲廠遷回簡村，在村邊購地重建廠房，並將其侄、其子的利厚生、貞利兩廠並為一大廠，改名為“世昌綸”繅絲廠。同時，仍在廣州楊仁南街開辦一昌棧絲莊，直接經營絲綢出口貿易，開創了工、貿一體化經營的先河。該廠一直辦至1928年才告結束。這是廣東華僑商人投資興辦擴建起來的廣東第一家（也是中國第一家）近代第一批機器繅絲工廠。¹⁹陳啓沅還撰寫專著《蠶桑譜》，系統介紹種桑養蠶和繅絲的經驗；《陳啓沅算學》13卷，介紹蒸汽鍋爐、蒸汽力量及其用法；《周易理數會通》8卷，專介紹蒸汽機器繅絲的技術，大大促進繅絲生產的發展。

同年幾個月後，順德縣龍江鎮的溫子紹，也在龍江鎮龍山創辦“利源興機器繅絲廠”，賺利之後，還拿出了3.3萬兩銀子捐造中國第一艘國產淺水艇（蚊子船）²⁰。

此後，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各縣均紛紛辦起新式繅絲廠，“以順德為多，南海次之，新會亦有，約近百家。近數年日更多設大廠，有用至八、九百工人者，大率以四、五百居多。”²¹

到了光緒年間（1875-1908年），廣東絲織製造業更進一步發展了。據不完全統計，光緒十

中外史事

三年（1887年），順德有機器繅絲廠42家，宣統三年（1911年）發展到142家，其中有22家僱用工人超500人；在142家織廠中有86家是機器繅絲，投資成本平均為2.6萬元，年產值平均為36.4萬元。當年全順德絲織製造業總產值達到3,900萬元。光緒三十年（1904年）新會有機器繅絲廠2家，僱工300多人，南海繅絲廠35家。廣州郊區有繅絲廠180家，每家僱工達到500人，²²民國元年（1912年）後不久，增至300多家，絲車女工達15萬人之多。²³

由於絲織製造業的工人日益增多，所以在廣州西關就建立絲織行業的會館——錦綸會館，為建立工人自己的組織——叢信館。

二、絲織製造業繁榮之緣由

明清時期廣東絲織製造業發展的緣由主要有三：一是種桑養蠶的“桑基魚塘”商品性農業的興起為絲織業提供充足的原料；二是以廣州為出口港、澳門為中轉港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生絲和絲織品出口國際貿易的拉動；三是蒸汽機引進使之產業升級轉型。

（一）種桑養蠶的商品性農業是絲織業發展的基礎

廣東的農業生產到了明清時期是商品性異軍突起，為世人所矚目。廣東的土壤和氣候適宜於亞熱帶作物生長，且自宋元以來已積累“桑基魚塘”的經驗。明朝初年，朱元璋又一再以法令形式要全國各地大量種植桑、麻、棉、棗等經濟作物。於是廣東的農業則由“果基魚塘”生產轉化為“桑基魚塘”。各府、州、縣普遍形成了種桑養蠶、養魚的熱潮。種桑養蠶，一地數用，成為一種立體經營模式。明初，蠶絲首次在市場買賣。這標誌著養蠶正式成為商品生產。到嘉靖、萬曆年間（1522-1620年），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番禺，順德等縣“桑基魚塘”生產方式已居於農業首位。萬曆九年（1581年），珠江三角洲各縣的桑田面積68,497畝，

佔農田總面積的30%。在南海縣周圍100多里地方，有農民10萬，田地1,000多畝，全部種桑養蠶。特別是九江鄉，已經出現門前屋後、院牆內外處處種桑養蠶的景象。而家庭婦女則以養蠶摘繭紡、織為主要生產活動。

清代，廣東已發展成為全國僅次於長江三角洲地域的蠶絲生產基地之一。南海、順德、番禺、新會和鶴山等縣已形成了“桑基魚塘”循環生態專業生產區。所謂“桑基魚塘”，就是：

將窪地挖深，泥覆四周為基，中凹下為塘，基六塘四，基種桑，桑葉養蠶，蠶矢（屎）飼魚，兩利俱全，十倍於稼（稻）。²⁴

這就是基堤種桑，桑葉餵蠶，蠶沙（糞）、桑葉梗餵魚，魚屎和塘泥肥桑的循環生物鏈經營，使自然資源生長不息，周而復此，不斷循環，形成自足的循環生物鏈生產程序。

這也正如陳啟沅在《桑蠶譜》所說：“蠶桑之物，略無棄材，蠶食剩之桑可以養魚；蠶之屎可作糞土，圍可以培桑，並可以培木，蔬菜雜根無不適用。……繅絲之水均可作糞土以耕織。”所以，到道光年間（1821-1850年），不少地方已經是以種桑養蠶為主，種稻為次的生產程序，如南海九江鄉就是“境內無稻田、仰糴於外”的種桑養蠶基地。龍江鄉“舊有稻田今皆變為基塘，民務農桑，養蠶為業”。²⁵順德縣的龍山鄉居民是“農桑養蠶為業”，每年蠶產八造，所繅之絲售於圩市。每當圩期，“絲家輒以萬計，故土絲之利更為倍云”。以九江、龍江和龍山為中心，出現了“棄田築塘，廢田樹桑”的熱潮，時人張鑒曾記述這種情形，云：

粵東南海縣屬，……周圍百餘里，居民數十萬，田地一千數百餘頃，種植桑樹，以飼春蠶。²⁶

地處東北的嘉應州也因地制宜，以養山蠶抽絲，“繭綢非家蠶，乃山繭絲也。”²⁷

到了咸豐同治年間（1851-1874年），順德、南海等縣許多鄉村農戶紛紛以種桑養蠶抽絲為生了，所謂“歲出蠶絲，男女皆自食其力”；“計一畝之

地，月可得葉五市斤，蠶食之得絲四斤，家有十畝之地，以桑養蠶，亦可充八口之食矣”。²⁸所以整個珠江三角洲各縣出現一派種桑養蠶的喜悅景象。正如張琳的《龍江竹枝詞》云：

剝繭茅寮傍水邊，柔桑牆外綠含煙。

魚蠶畢竟收成好，十畝基塘勝種田。

而且在農村基層的圩市中，出現定期的貿易蠶絲的絲圩，史稱：

江村所屬有十四圩，隸水藤堡有絲圩；隸

逢簡堡者有二：日雜貨，二、五、八日；日蠶

絲，三、六、九日。²⁹

正是因為廣東各地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各縣鄉農村普遍種桑養蠶、抽絲出售，給明清廣東絲織製造業提供充足的蠶絲，從而促進全省絲織製造業的空前發展和繁榮。

（二）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全球化對廣東絲織製造業的拉動

世界經濟發展史有力證明，商業的擴張往往是先於並拉動工業製造業發展的機制。正如馬克思所說：

商業，是資本所由發生的歷史前提。世界

商業和世界市場是在十六世紀開始資本的近代

生活史的。³⁰

近代許多國家海外貿易的發展都是走在工業進步的前面，而且經常是推動著工業沿著海外貿易的發展變化曲線前進。歷史事實證明，明清時期廣東海上絲綢之路拉動了廣東絲織製造業的發展。

明清兩代都在不同時期實行過海禁政策，但對廣東則實行允准開放對外貿易的政策。嘉靖元年（1522年）“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³¹；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宣布，封閉閩、浙、江三海關，規定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³²。這樣一來，自1522-1840年的381年，廣東（廣州）就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唯一合法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外國商船來中國貿易“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³³貿易，而中國“廣州船舶往諸番，出虎頭門，始入大洋”³⁴貿易。於是中國就以廣州為唯一出口港，開闢了廣州—澳門—果阿—里斯本；廣州—澳門—長崎；廣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巴西；廣州—澳門—望加錫—帝汶；廣州—澳門—

北美洲；廣州—澳門—澳大利亞；廣州—澳門—俄羅斯等七條航線，形成了以廣州為始發港和以澳門為中轉港到五大洲各個國家和地區環球貿易網絡。廣州和中國各地的大量生絲和絲織品通過廣州出口運往世界各國和地區出售貿易，甚受歡迎和讚揚。據中外史料記載，1515年（正德十年）：

中國商人也越過大海灣行至馬六甲，以獲取香料。他們從自己的國內帶來了麝香、大黃、珠珠、錫、瓷器、生絲，以及各種紡織品。³⁵

葡人在澳門、廣州之貿易輸出品以絹為大宗，每年由葡人輸出之絹計五千三百箱。每箱裝繡緞百卷，薄織物一百五十卷。³⁶

《葡屬亞洲》一書斷言，他們每年的出口達5,300箱。精製絲綢，每箱包括100匹絲綢、錦緞，和150匹較輕的織物（衛國在他的《中國新地圖集》中說有1,300箱）。³⁷

嘉靖二十年（1541年），在廣東亦有商船將綢緞運到東南亞、葡萄牙、滿刺加等地貿易，史料記載：

許六……將帶連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各造三桅大船，節年結夥收買絲綿、綢緞。³⁸

萬曆八年至十八年（1580-1590年），每年廣州經澳門運往印度果阿的絲貨有3,000擔；二十八年（1600年），廣州經澳門中轉運往歐洲的白絲1,000擔、各種綢緞10,000—20,000匹；崇禎九年（1636年），運往果阿的絲貨6,000擔。運往日本長崎的生絲2,460擔³⁹。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後，從廣州經澳門、馬尼拉運往墨西哥的絲織品也不少，並受當地民衆的購買和稱讚：

每年有一個接船帶著幾個小船，滿載著銀子和傳教士，從阿卡普爾科起航；跨越太平洋至馬尼拉；返航時則滿載中國的絲綢和棉紗，這是美洲人士最熱望購買的。⁴⁰

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上層人士生活奢侈，擁有大量銀元，他們特別醉心於中國的絲綢。中國絲綢質地優良、價格優廉、式樣新

中外史事

穎、工藝精美，在拉丁美洲極為暢銷。……

從馬尼拉販運中國貨，成了西屬美洲商人的主要謀生之道。以致墨西哥除了銷售中國絲織品，不復銷售其他國家的紡織品。⁴¹

因此，墨西哥用來購買中國絲綢的白銀即經馬尼拉流入廣州，史稱：

在1565-1820年，墨西哥向馬尼拉輸送了銀4億比索（墨銀元），絕大部流入中國。⁴²

到了清代，雖然在廣州出口的商品結構發生了變化，絲綢輸出退居第二位（茶葉居首位了），但外國商人從廣州採購的生絲和絲綢仍然相當大量。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在《奏請將本年洋商已買絲貨准其出口摺》云：

惟外洋各國夷船到粵，販運出口貨，均以絲貨為重。每年購買湖絲並綢緞等貨，自二十萬餘斤至三十二萬斤不等。統計所買絲貨，一歲之中，價值七八十萬兩，或百餘萬兩；至少之年，亦買價至三十餘萬兩之多。其貨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販運來粵，賣與各行商，轉售外夷，載運回國。⁴³

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國撤銷了東印度公司的對華專利權後，絲貨出口到英國激增，1833-1837年，每年達10,000擔。同時，在19世紀初中期，美國來華貿易，在廣州購買絲貨亦佔總商品量的33%左右⁴⁴。乾隆年間（1736-1795年），從廣州運往美國的生絲和絲綢達到20-30萬斤。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美國的“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首航廣州，除了購買茶葉之外，也購買大批絲綢。道光十年（1830年），美國從廣州運回生絲達到70.53萬斤，其中廣東絲36.8萬斤，南京絲33.73萬斤。⁴⁵

如上述明清頂峰發展的海上絲綢之路，從廣州輸出如此大量的生絲和絲織品（綾、羅、綢、緞、錦等）到世界各國貿易，必然拉動廣東以至全國絲織製造業的不斷發展和繁榮。這是經濟發展自身的必然規律，才使我們今天回顧，看到明清時期廣東絲織製造業興旺發達的光榮歷史景象。

（三）產業革命蒸汽機的引進加速廣東絲織製造業升級

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乾隆二十五年以降）開始的英國產業革命，首先是以蒸汽機開始在紡織業使用，使原來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過渡到以機器生產技術新階段，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前述同治十三年（1874年）南海縣簡村陳啟沅創辦的“繼昌隆機器繅絲廠”，就是他從越南購買引進一部外國舊輪船的蒸汽發動機，然後加上自己設計的相關機械組合繅絲機進行繅絲生產的。

陳啟沅買了蒸汽機和設計了機械，但他卻不懂得如何把蒸汽機和各種機械聯接安裝成為一台自動的繅絲機。於是他去廣州十八甫桂塘新街找到“陳聯泰機器廠”的老闆陳淡浦（1817-1876年）。陳淡浦是南海縣丹灶鎮良登村村尾坊人，見是南海同鄉，於是令其第二子陳濂川、第六子陳桃川等三人一起對陳啟沅的設計圖紙進行研究，決定幫他聯接和安裝成中國第一台機器繅絲機，並於1874年繼昌隆機器繅絲廠投入生產。

此後，陳淡浦在其機器廠製造繅絲機供應珠江三角洲各地的手工繅絲作坊改造為機器繅絲廠進行繅絲生產。使珠江三角洲各地的機器繅絲廠普遍發展起，從而促進廣東絲織製造業向近代化發展，生產更多的生絲和絲織品提供對外貿易出口需要。

陳淡浦第六子陳桃川則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自己在十三行晉源街創辦均和安機器廠，專門為繅絲廠修理蒸汽機，對於晚清廣東機器繅絲製造業作出貢獻。民國初年，均和安機器廠遷址到廣州河南大基頭，至1937年招收和培訓出技術工人3,000多人。人們稱陳桃川為“機器老人”。

三、絲織製造業發展折射婦女個性解放

明清時期廣東出現種桑養蠶、以蠶繅絲、以絲織布的商品性農和絲織製造業繁榮景象，需要大量女絲工、女織工，這樣無數青年女子得以自食其力，經濟自給獨立。這麼一來，不少女子為了自

由獨立謀生，或擺脫封建婚姻的羈絆而宣告自梳毛髻，終身不嫁；有些女子被家長逼著下嫁，也堅決不落夫家，保持一種有名無實的婚姻關係。這兩種女子把頭髮梳成高大的髮髻於後頭，夏天穿黑膠綢衫，集中住在不讓男人進入的屋室，後人稱之曰“姑婆屋”。這種“自梳女”情況，據近人鄔慶時於1903年調查的資料，番禺南村數千名女子，出嫁者僅數人而已，至1909年全部“自梳”，無一人出嫁。順德容奇縐絲廠有1,000名女絲工，就有800人自梳。⁴⁶這些自梳女沒有家庭的溫暖，同居一屋檐下，朝夕相處，大家互相關照，嚴格執行不嫁夫君誓言。如果有哪一個叛逆出嫁，就會受到眾姐妹的蔑視、奚落甚至懲罰。他們自己自願成立一個不是很嚴格的組織用以維繫互相關係，稱為“金蘭契”或“十姐妹”。時人對此有所記述：

廣州女子多以拜盟結姐妹，名“金蘭契”，女子出嫁後歸寧恒不返夫家。若促之過甚，則眾姐妹相約而自禁。……此風起於順德村落，後傳染至番禺、沙莞一帶，效之更甚，即省會中亦不免。⁴⁷

這種婚俗實質是原始社會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社會的遺俗，本來是遺留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但在經濟相當發展的明清珠江三角洲的順德、番禺、南海、台山、新會、鶴山等地，卻因為絲織製造業發達而獲得經濟獨立的女子中重新復古出現。不僅草根平民百姓有此情況，連一些士人（知識分子）也有此種情形。明末清初廣東著名文士屈大均也曾遭此境遇，史稱：

翁山（屈大均字）因前妻仙嶺鄉劉氏不落家，而以王華姜為繼室。⁴⁸

此輩女人在台山、新會、順德為最多。⁴⁹

因為“自梳女”、“金蘭契”的女子同居一室，而且屬青春時期，還出現過如今天所說的“同性戀”的情況，史料記載：

情同伉儷……一女同居，雖不具男女之形式，實具有男女之樂趣。⁵⁰

清人曾蘇紹在《順德竹枝詞》也賦詩描寫“同性戀”的情況，云：

綺羅叢裡契相如，姤後居然伉儷隨。
筮得坤爻空血戰，無陽畢竟使陰疑。

上述明清時期由於廣東絲織製造業發達而折射出“自梳女”“不落夫家”的返祖現象，其根源在於經濟發展後女子有了經濟獨立的自立能力。我們反觀今天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女子經濟獨立而出現晚婚晚育，只同居不婚，甚至不結婚，結婚後又情願作丁克家庭。就算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由於經濟迅速發展，男女平等就業，女子經濟獨立，上述現象也時有出現。以此類推，反觀明清時期廣東“自梳女”、“不落夫家”女性史，就不足為奇了。社會在發展，經濟在增長，人們的觀念在改變。世間上沒有一成不變的常態，但人類社會總是向前發展的，明清時期如此，當代社會也如此，用不著杞人憂天。■

註釋：

1. 曾少聰：《東船航綫移民》，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4頁。
2. 《聶氏家譜》。
3. 黃佐：《嘉靖廣州府志》，《物產》。
4. 張嗣衍、沈廷芳：《乾隆新修廣州府志》卷48，《物產》。
5. 《咸豐七年本》卷2。
6. 范端昂：《粵中見聞》卷35，《物部》。
7. 《咸豐順德縣志》卷3，《物產》。
8. 阮元：《廣東通志》卷97，《輿地》。
9. 阮元：《廣東通志》卷98，《輿地》。
10. 《光緒嘉應州志》卷6。
11.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貨語》。
12. 汪宗淮、冼寶幹：《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14，《人物》。
13. 《佛山史料匯編》（二），第234頁。
14. 《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6，《實業》。

中外史事

15.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II, No.7, Nov.1833, p. 305-306.
16. 《乾隆廣州府志》卷48,《物產》。
17. 阮元:《廣東通志》卷97,《輿地略15》。
18. 徐廣陞:《不自謙齋漫存》卷6,第25頁,光緒八年版。
19. 以上引文均見桂站:《宣統南海縣志》卷21,《列傳八,陳啟沅》;陳天杰、陳秋桐:《廣東第一間蒸汽繅絲廠繼昌隆及其創辦人陳啟沅》,《廣州文史資料》第8輯。
20. 《廣州日報》2014年11月2日。
21. 《宣統南海縣志》,《物產志》。
22.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中華書局,1962年,第365頁;陳啟沅《蠶桑譜》,第1-2頁,《順商傳奇》,廣東旅遊出版社,2015年,第14頁。
23. 呂學海:《順德絲業調查報告》(原稿)。
24. C·W·Howard, *A Survey of the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 (考活:《南中國絲業調查報告》,1925年,第828頁)。
25. 《道光龍江志略》卷4。
26. 張鑒:《雷塘庵主弟子記》卷5。
27. 《光緒嘉應州志·物產》。
28. 《咸豐順德縣志·風俗志》:《道光龍江鄉志》。
29. 轉引黃啟臣主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修訂本),廣東經濟出版社,2014年,第476頁。
30.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3頁。
31. 《明史》卷75,《職官四》。
32. 《軍機處上諭檔》,見《清宮廣州十三行檔案精選》,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第107頁。
33. 《明史》卷325,《外國六》。
34.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20,《海外諸番·入貢互市》。
35. 張天澤著,姚南、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中華書局,1988年,第38-39頁。
36. Anders Ljungsted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1836, Hong Kong, 1992.
37. 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2年,第100頁。
38. 朱紉:《覽朱雜集》卷4,《三報海洋捷音事》。
39. C.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ao: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 1963, p. 144.
40. 冠帕屈克:《拉丁美洲簡明史》,劍橋大學出版社,1938年,第28頁。
41. 轉引李春輝:《拉丁美洲史稿》上冊,第326頁。
42. 轉引李春輝:《拉丁美洲史稿》上冊,第329頁。
43. 《史料旬刊》第5期,京華印書局,1930年。
44. 陳高華:《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155頁。
45. H·B·Morse, *The Chronicl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China, 1636-1834*, Vol 3, p. 247.
46. 葉春生:《嶺南民間文化》,第三章第七節,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47. 張心泰:《粵游小記》。
48. 《屈翁山年譜》。
49. 向南:《西南旅行雜寫》,載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試刊號),1985年,第107頁。
50. 胡朴安:《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七《廣東》,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